

緒論：定位文化研究及本書

目次

壹、文化研究中的對立意見	/5
貳、協調	/7
參、本書架構	/11

本書論點之一是研究法或研究方法論絕非「客觀」，而是受到特定的社會位置、歷史時期及其目標所定位、指引。因此，為了定位本書，必須先瞭解本書源自我對飲食失調 (eating disorders) 論述及生命經驗的研究。大致而言，飲食失調是女性的心理疾病，特點是為追求苗條而甘冒風險。我開始研究這些狀況實為不得不然，原因是我本身即罹患厭食症；由於這些情況是透過下述兩種層面來研究，我因而感到困惑，甚至憤怒。首先，這些研究認為罹患厭食症的女性為「失調」，甚至無法評估本身思想行為，我對這種研究方式大感不滿。在許多研究中，厭食症患者的言論僅被視為是一種「症狀」，其中「真正」的意義(例如心理或社會的病狀)都可藉由精神分析師甚或女性主義文化評論家解讀而出。再

者，對於厭食症患者(顯然並未意識到其狀況的「意義」或根源)被迫接受的社會、政治策略及論述，我也感到挫折。一直以來，對於厭食症的解釋很容易便使批判者注意到身體理想、家庭結構的性別歧視本質，以及(後)現代自我控制的失能(dysfunctionality)。此外，對厭食症的解釋也常對厭食症患者，或者一般女性天生的病態本質言之鑿鑿，視女性為虛榮、過度依賴他人及他人意見，並常助普遍的社會服從及保守主義一臂之力。

因此，受到這兩項我所關切問題的驅使，我開始著手於一項研究計畫，這項計畫目標在發展出一些方式，公正評論關於厭食症的生命經驗，並批判性地分析組成這種經驗的相關論述。然而，我與罹患厭食症的女性進行的訪談雖然包含了許多具挑戰性且有趣的深入見解，但這些訪談也以關於厭食症醫學概念為基礎，這些概念問題重重，也正是我想批判的對象。這讓我遭遇第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一個人要如何公正評論人的生命經驗，但同時又批判分析形塑我們經驗的論述？

再者，我對飲食失調相關論述的分析帶領我進入意料之外的境界。研究當代厭食症診斷標準的歷史，引領我進而研究一九二〇年代的美國移民政策，以及戰後或冷戰時期美國的政治、文化及知識脈絡。有些流行偶像促成飲食失調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例如卡本特(Karen Carpenter)及黛安娜王妃，我針對這些偶像的分析進一步引領我討論一九六〇年代的基進主義及尼克森(Nixon)時期的新保守主義間的論戰，之後我則繼續研究我的新家園周遭，亦即矛盾的新勞工政治及一九九〇年代英國的氛圍。然而，羅列出厭食症及其定義的社會關連後，對我而言，另一項方法論上的兩難也隨之產生：一個人如何批評構成「現實」的論述，例如厭食症的論

述，同時發表關於歷史及政治現實的言論？

最後，個人的憤慨讓我開始探索，這種探索也讓我研究了二十世紀北美及英國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過程、發展及架構，這種方式是我始料未及的。研究進行的同時，我必須提出一套架構來研究厭食症的生命、推論及歷史與社會面向，並遊走於不同的方法論觀點及書寫文類中。不同的方法論取徑間常有截長補短之效，但這些取徑也會逐漸造成實際上的困難及理論上的矛盾。本書根據本人以及其他諸多學者的研究，力圖提供一個指南，以引導讀者如何研究當代現實中實際、推論及社會、政治的本質。我的目的是寫一本在開始研究之前，我會希望閱讀的書。

壹、文化研究中的對立意見

但我的知識信念不僅受到我的研究影響，也受到文化研究的歷史，以及這種歷史如何在我工作或研究之處發揮作用的方式引導。目前已成傳奇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在一九七〇年代塑造文化研究成為一門學科。稍後，於一九八〇年代時，我在芬蘭坦普拉大學(University of Tampere)攻讀第一個學位，並進入文化研究的領域。當時文化研究不再是身處邊陲的學門，反而逐漸成為主流，並在斯堪地那維亞的學術系所佔有一席之地。因此，即便我讀的是一門理應「客觀」的學科，例如新聞學，我修習的課程仍主要在意識型態、霸權、抗拒、後現代性、表徵及敘事等方面。我一開始針對哥斯大黎加另類媒體及芬蘭年輕佔屋居住(squatter)活動的研究計

畫，大量取經自英國文化研究的變化形式，特別是其對「抗拒」的興趣。我和一九八〇年代時的同學，以及自己在二十一世紀的學生，都喜愛抗拒的批判及「歡樂」光環。抗拒看到文化中的「希望」，而不像某些悲觀的批評分析，認為文化主要是有安撫人心的功能。抗拒強調流行文化形式，例如青少年文化及運動中的創意潛能，以挑戰主流意識型態及社會，即便這種潛能不一定會解釋為何會造成激烈的社會轉變。

在極早期階段，我針對厭食症的研究可能受到一些厭食症患者抗拒厭食症相關論述的模糊概念影響，但這些概念很快就被拋諸腦後。這部分是由於我與罹患厭食症之女性的訪談非常複雜，無法以屈從於主流意識型態或抗拒主流的角度來描述。再者，對抗拒的研究遭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舉例而言，這些研究被批評為揭露學者的政治幻想，例如對青少年、女性主義、勞工階級、反叛的幻想，甚於其研究的現象(Morris, 1990; Nightingale, 1992; Stabile, 1995)。但我認為分析意識型態給予人對生命經驗、文本及脈絡的實證研究的深入看法，我也認為不瞭解這些古典取徑，便難以理解之後文化研究的方法論潮流，原因即使這些研究已不使用古典取徑的語彙，古典取徑仍常會持續強化在典範內進行的研究。基於這些理由，我在本書中花了幾個章節的篇幅，概述研究生活及文本文化，並討論其缺點及持續的相關性時，使用的意識型態取徑及抗拒取徑。

我放棄抗拒典範也和我於一九九〇年代，從芬蘭搬到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香檳校區(Urbana-Champaign)攻讀博士學位的时间重疊。當時香檳校區是美國文化研究的麥加聖地，我的論文口試委員會眾星雲集便是例證。其中有克利斯汀斯(Clifford Christians)、柯爾(C. L. Cole)、丹則恩

(Norman Denzin)、葛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及特萊區勒(Paula Treichler)。我的指導教授丹則恩當時正在發展詮釋性研究的新模式，以回應來自後殖民主義及女性主義的攻擊。這些理論皆認為，社會科學並未瞭解邊緣族群，例如女性、勞工階級或非西方民族，只是把這些族群當作合理化學者政治及理論計畫的工具，學者的計畫範圍則可從殖民主義到馬克思主義(請參考 Clifford 及 Marcus, 1986)。這種新的詮釋性或民族誌的研究計畫目的，是找出更多合作的方式，對那些對不同世界的有較高敏銳度，並瞭解我們理解有其限制及責任之人，加以研究及書寫(Denzin, 1997a)。同時，我另一位口試委員會的成員葛羅斯伯格也正開始批判社會研究中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並指出我們應該開始注意日漸造成剝削的物質及經濟發展，這樣的發展因大家對各種文化及經驗的興趣而遭到遺忘(例如 Grossberg, 1998)。在這種情況下，我多少覺得自己在文化研究實證研究的兩種潮流中拉扯，而文化研究有興趣的不是個人經驗的微觀世界，便是全球、經濟權力結構的宏觀世界(Saukko, 1998)。

貳、協調

然而，最近文化研究中實證研究及方法論的討論多少模糊了這些對立意見的界限。原始新民族誌批判的先鋒克力福特(Clifford, 1997)及馬庫斯(Marcus, 1998a)加上其他人(Appadurai, 1997; Haraway, 1997)，已開始論及我們的研究如何超越傳統典範以及地理的界限。舉例而言，這種超越模糊了文化和經濟間的分野，也粉碎了能簡單定義的研究客體，例

如次文化或之概念。因此，社會學家的年輕人次文化或人類學家的村落似乎不再是可各自分離的場所，而較像是網絡中的中心點；跨國媒體、金錢、人、事及形象的各種流動橫跨這些中心點，並加以塑造。我的研究主題——厭食症，一般視為是一種心理問題，同樣跨越了不同的生活領域及分析層次。因此，我的研究繼續下去時，厭食症便開始變得極為私密、和個人及人際有緊密關連，同時又有大量醫學和流行論述夾雜其中，並與廣泛的社會、政治甚至全球軍事制度產生微妙但穩固的連結關係。

這種模糊界限的情況，有時會以千禧年的流行口號「全球化」加以描述，在這種情況中，經驗、文化及「真實」(或媒體研究中的「閱聽人」、「文本」及「生產」)間的分野越來越不清楚。就某方面而言，這種新的景況帶領我走向我其他口試委員會成員的研究興趣領域，也就是科學研究(Cole, 1998; Treichler, 1999)及對話理論(Christians, 1988, 2000)。科學的文化研究一直位於發展混雜方法論的最前線，大致而言，這種方法論可帶領我們超越下列論戰：物質真實決定、或比語言及文化重要，抑或語言或文化決定、或比真實重要。借用哈樂蕨(Haraway, 1997)的概念，論述，例如關於厭食症的論述，最好能視為是「物質符號」的力量，這種力量源自於特定的歷史脈絡，並造成象徵性及實質的改變。因此，關於厭食症的論述塑造出我們對於自我最基本的概念，也塑造我們定義何種自我是「健康」及何種自我是「失序」的方式。同時，這種論述也造成特殊的治療制度及生活型態，成為流行媒體形象的一部分，也被用來作為各種社會、政治制度有害或有益的根據。

這種關於厭食症的論述將這些象徵及實質的、在地的及全球的面向交織在一起；但每種面向都有其特殊性。一個人

的生命史和冷戰歷史也許有所關連，但我們需要不同的取徑，捕捉生命和一般的歷史。從方法論的觀點來看，這造成兩項挑戰。首先，為了瞭解這種經驗的特定面向，我們必須嚴格運用一種適當的方法論。舉例而言，如果一個人想瞭解並傳達一個罹患厭食症女性的獨特之處及其與他人的細微差別，我們必須謹慎參考並運用關於研究、書寫不同生命世界之方式的新民族誌著作。再者，我們必須明白這種獨特之處並非生命經驗唯一具備之物。社會論述(例如醫學定義)以及經驗所處之歷史及社會脈絡也塑造了經驗。然而，為了捕捉這些厭食症經驗的其他面向，我們必須使用不同的方法論取徑及方法，例如論述分析或歷史研究。

對許多研究新手及經驗老道，但和所有人一樣面臨各種時間壓力的學者而言，熟用一套不同的研究取徑並加以結合聽起來會令人卻步。任何研究計畫的成功，都取決於在野心及能夠實際操作的方式之間艱苦地取得平衡。因此，我並不建議所有的研究計畫都結合好幾項觀點。反之，本書不同章節的目標便是強調各種研究方式的特點、優點、可能問題及疏漏之處，以概述進行研究的不同方式，並提倡將這些方式加以結合的方式。舉例而言，我希望能多檢視更多絕佳的、完美的新民族誌，這些民族誌傳達出獨特或「特殊」生命經驗的微妙肌理，同時也為「普世」發言，亦即突出我們當代社會世界的一些重大困境。同時，我也希望指出習慣運用老套故事，將其視為「真實」經驗的問題。而做這些事的，包括一些實驗研究流派及日間時段的談話節目。這些故事充滿個人陰謀及對身體的羞辱，例如鉅細靡遺地描述肥胖的可怕(Kiesinger, 1998)。但在討論不同研究取徑時，我不僅希望突顯各取徑的特點，也希望強調這些取徑彼此如何產生關連。找出不同研究取徑之間的聚合點(例如研究生命和全球的真

實)，是為了整合不同取徑的方式，以拼湊出也許更為複雜、細緻之處，即便我們對於研究現象所進行的分析，決不可能完整。

這種建立不同觀點間對話的需求，最終帶領我到目前的研究家園——李斯特大學大眾傳播中心(Center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在一九七〇年代，李斯特中心成立，廣大的英國學術社群同時也將該中心塑造成與伯明罕中心文化主義分庭抗禮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科學據點。然而，那樣的日子已經遠去，今日的李斯特大學最為人熟知的，或許便是國際溝通方面的研究，這項研究最近才在全球化一詞的帶動下，有了新的意義。針對「全球」的論述或許帶有一點知識及時興的樣貌，但全球化需要的是當代世界中生命的、中介的、宗教的、族群的、性別的、經濟的及政治的面向之互動分析。同樣地，全球化創造了一個跨學科的空間，在其中各種理論及方法論的取徑都能看似和平地共存，而這些取徑挑起了對話、論戰，彼此也相互借用，並且謹慎地交融。

在整本書中，我強調注意文化或知識現象、物質環境及政治制度如何交織的有其必要。我為本書作最後的技術修訂時，再一次想到這些互動的重要性。我修正全書，瞭解到伯明罕文化研究的原始搖籃才剛經過「重新架設」，而我在李斯特的工作環境由於不斷「重組」，敗壞到令人難以想像的地步。即使最近預算刪減對英國文化及溝通研究的跨學科領域似乎造成不小的打擊，終點也都只是起點。我正準備前往艾希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擔任跨學科研究團隊的一分子，以研究基因體的意義。或許和其他新的社會發展相較，基因體更可以開創新方式，以理解、研究物質及文化在個人及社會生活中的連結。對於新的社會現

象，我們需要更多(而非更少)方法論上的精闢分析、批判性分析及文化分析；這些新的社會現象可能會挑戰我們關於自我及社會安排的基本意涵。

參、本書架構

在我接下來概述本書架構之前，我希望澄清本書是與「方法論」(methodology)相關，而不是與「方法」(methods)有關。希臘修飾詞「logos」(知識)造成的差異，在於方法指的是瞭解經驗真實的特定「工具」，而方法論指的是工具、哲學及政治信念的結合，後者的範圍更廣泛，而且有特定的研究「取徑」。方法和方法論常是如影隨形，因此企圖「深刻」理解他人經驗的詮釋方法論取徑，常伴隨某種研究方法(例如參與觀察)，以便讓學者及研究對象發展出彼此互信的關係。然而，同樣的方法也可以支持不同的方法論信念。因此，訪談法也可以用來支持以收集「真實」資訊為目的之唯實論方法論取徑，或支持詮釋方法論取徑，以完整瞭解一個人的生命故事(參見 Alasuutari, 1995; Kvale, 1996; Silverman, 2001)。

我選擇將重點放在方法論的第一個理由，是已有許多講述方法的書籍適合文化研究(例如 Alasuutari, 1995; Flick, 1998; Silverman, 2001)。但我決定不寫方法的主要原因，是許多講述方法的書籍(當然並非全部)以實證主義的角度將方法視為「放大鏡」，以插入學者及所研究的真實之間。我們可以瞭解，如果正確使用這些方法(或鏡片)，或根據指示使用，可以幫助學者更接近「準確」或客觀、無偏見的真实觀點。但本書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探討我們改變看待真實的研究

取徑或鏡片時，真實如何變化。因此，我不會將「參與觀察」視為方法。反之，我會討論「新民族誌」如何試圖公平看待他者的生命世界，也會探討「後結構」的研究取徑。此取徑批判性地分析社會及制度論述，這些論述交織於任何生命經驗或世界。新民族誌及後結構的取徑都可能使用參與觀察，但其「觀察」可能截然不同。

然而，儘管這樣的重點可能較廣，我仍然會說本書是一本「使用手冊」。即使我的部分討論可能比一些講述方法的著作抽象，本書目的仍在提供意見，討論「如何」在每個討論的研究典範間進行研究。但我並非要提供一本講述如何利用科學方法「客觀」研究社會真實的書。我的目的在於提供一本書，來鼓勵對社會現實反省式的社會及文化研究，能瞭解研究的理論和政治信念，以及其影響、優點及疏漏。最近出現將焦點放在文化研究「方法論」的實證及理論書籍 (McGuigan, 1997; Couldry, 2000; Lewis, 2002)，我認為這些書籍的出現代表越來越多人承認我們需要多加反省，我們的研究總是帶來一種片面的、政治性的真實觀點。但即使本書並不同意我們應該找出「唯一」真實的「唯一」真相，卻也不提倡相對主義的觀點，而認為不同的方法論取徑開啟了多重、無同一標準的「真實」。反之，本書希望激起不同研究世界使用的不同方法論取徑間之交流或對話，以培育出一種文化研究來瞭解當代全球、社會及個人真實的複雜性及多面向性。

在描繪本書的輪廓時，我們是依據「X 檔案 (*X-Files*) 的公式」(Lavery et al., 1996)來進行架構，並且是根據每一章內容都可獨立閱讀來安排，就如同每一集的 X 檔案 都可獨立觀賞一樣。但讀完全書的讀者，仍會比只讀有興趣的特定章節之讀者，更能從每一章中得更多收穫，就如同 X 檔案 的忠實觀眾會比偶爾觀賞的觀眾更「知道」每一集的意義。

本書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由前言加上第一章組成，我們會討論文化研究方法論的歷史，以釐清「文化」一詞的意義為何，並概述結合這些接下來的章節會討論的方法論取徑之「對話」方式。第二部分討論了理解生命經驗的研究取徑。本章概述以「抗拒」的觀點研究所經歷生命的方式，從現象學或詮釋學新民族誌角度出發，也從後結構觀點加以研究。現象學或詮釋學新民族誌用以理解他者，後結構觀點則探究社會及制度的論述，如何組成我們生命經驗及認同。第三部分概述研究文本及論述的方式。本章討論了以「意識型態」及系譜取徑的角度檢視文本的分析模式。上述取徑闡明了我們視為理所當然之現象的歷史本質。本章也概述了德希達的解構分析。德希達的解構分析闡明了深植於文本或論述中，潛藏的二元規範，並指出方向，讓解構更有建設性，且不只是能夠批判文化，還能批判建議的其他社會組織方式。最後的第四部分是本書的結論。本部分的第一章，即全書第八章討論了關於「空間」的批判性地理著作，以及這些著作如何用來理解全球化的宏觀過程，與這些過程其中一些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第九章介紹了幾種方式進行「多重場域」及「多重分支」研究，這樣的研究結合了研究當代社會真實的生命、推論及物質/空間取徑，以捕捉住其中一些全球及在地、情緒及經濟、詩意及政治的面向。

《文化研究取徑：新舊方法論的探索》介紹了文化研究古典的實證取徑，例如抗拒及意識型態的分析，但卻較偏向新的取徑，例如新民族誌、系譜學及多場域的分析。重點在此的理由是有許多這個領域的人「進行」這種研究，但卻沒有太多著作反省他們進行的方式，且幾乎沒有任何著作談論這些研究如何結合，以促進文化研究中，不同理論、方法論、實證及政治立場間的對話。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本試閱版僅提供尚未上市的校稿版本，目的是為了方便讀者先睹為快。所以，此試閱版本不論是內容或排版，都與最後上市的版本，仍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Email: weber98@ms45.hinet.net)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正式送印之前能做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